

那些有伤的 读书人

谢志浩 著



百年学人的焦虑与反思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那些有伤的读书人

—— 百年学人的焦虑与反思 ——

谢志浩 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有伤的读书人 / 谢志浩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133-0753-6

I. ①那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4113 号

那些有伤的读书人

谢志浩 著

统筹监制: 绿 茶

策划编辑: 李明通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上善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21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753-6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- 1 蔡元培：神话与神化
- 4 陈寅恪的“志业”与“心迹”
- 13 胡适：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！
- 18 致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
- 28 雅人深致金岳霖
- 33 温柔敦厚潘光旦
- 36 玉树临风陈岱孙

- 40 倔强蔡尚思
- 46 周有光：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？
- 52 六朝人物张中行
- 60 寂寞周辅成

- 62 有趣的金克木
- 71 播种者费孝通
- 102 季羨林：纯正的学问家
- 107 任继愈：柔弱中带伤
- 112 体悟顾准
- 127 王元化：有学问的思想家
- 140 谢韬：老战士，永不死！
- 150 唐德刚：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
- 154 舒芜：摇晃的人生
- 160 陈乐民：菊花残，满地霜
- 169 吴敬琏的良知
- 176 江平的呐喊
- 180 焦虑钱理群

184	杨小凯与刘道玉、茅于軾、周其仁
213	硬汉郑也夫
251	秦晖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
263	贺卫方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
267	王铭铭与老辈人类学家
290	跋

蔡元培：神话与神化

记得几年前北京大学韩水法先生写出《世上已无蔡元培》，行文带有德国哲学特点的缜密思维和逻辑推理，引起知识界普遍的唏嘘感叹：难怪事情做不好，原来没有蔡先生啊！

2007年，正值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纪念，我在《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》一文中，曾经指出：“我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，通才教育、学术自由，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，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。”

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，深刻反省我们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态度，大有必要。

首先，给我的感觉，台湾和香港的大学似乎没有神化蔡元培先生，而是大陆对蔡元培先生进行神化。梁漱溟先生神化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、独树一帜。梁漱溟老先生晚岁回忆蔡元培先生时，肯定把蔡元培先生礼聘自己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佳话予以了加工提升。梁漱溟老先生有一番话，大意是：中国共产党出自北京大学，而蔡元培先生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。

这种提法，随着梁漱溟先生去世，已经很少有人提了。但

是，梁漱溟在神化蔡元培先生方面，确是先驱人物。

1988年，正值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，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，高中同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，这样，我得以作为局外人观察北大校庆。那时候，北大对于蔡元培先生，好像是保持着一种温情的，但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，北大好像对蔡元培已经是彻底地神化了。也许，伴随着神化的，正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摒弃。但是，这种大学理念在一些校长比如说丁石孙、王义遒那里，还是不绝如缕的。

正当许智宏校长准备向蔡元培先生学习的时候，许多教授却觉得现在的北京大学没有资格学习。这让人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，其实都是欧美现代大学的常识，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对于欧美伟大的学府来说，那是现代大学的底线。蔡元培先生凭借卓越的声望，成功地将欧美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移植到北京大学，梅贻琦、竺可桢、蒋梦麟、胡适、罗家伦接续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，守护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，开创了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。

当代中国大学似乎陷入了迷思。相对于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可以说是除了思想都自由，除了学术都包容。我们奇怪，大学可以包容官僚，可以包容奸商，图书馆可以自由地少买书，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少买实验设备。国家要创新，社会需大师，校园应寂寞，思想盼自由。北京大学特别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，但是，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具有底线的大学，大学独立、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都是现代大学的底线。

纪念蔡元培先生，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力量，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修养的力量、科学的力量。修养和科学具有无穷力量的源泉，就是寂寞和自由。其实，我们的大学校长并不是没有力量，他们比起蔡元培更有力量，我们大学校长的力量是行政的力量、经济的力量。具有行政和经济力量的校长，经常慨叹自己没有力量，还算是比较清明。但是，他们不是慨叹自己欠缺修养的力量、科学的力量，而是埋怨自己行政、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大。提到蔡元培先生，他们不自觉地神化，潜意识中不愿意保持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，蔡元培先生就成为熟悉的陌生人。

真希望当今的校长，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，温情地理解蔡元培。不要忘记，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，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。当今的这些校长其实与地方官员相仿，具有强大的能量，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，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陈寅恪的“志业”与“心迹”

近世文化巨擘梁启超先生曾经深刻指出，中国文化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：中国的中国时代，亚洲的中国时代，世界的中国时代。梁任公把“世界的中国时代”起点定在乾隆年间，笔者觉得还可以追溯到晚明。因在明朝末期，也就是公元1500年前后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全球逐渐进入“共时”的大历史。世界各地部落、朝廷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，世界文化史进入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。一方面，经过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，僻处西欧的“地方性知识”日益摆脱狭隘的视阈，为世界文化史平添一股激越的“洪水”，继而形成“普世伦理”；另一方面，几乎所有拥有“地方性知识”的国度，在面临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，致力于忠实输入外来学说的同时，都不忘记本来民族的地位，进而达到文化自觉。

陈寅恪先生（1890—1969年）正是“世界的中国时代”应运而生的一代文化巨人。公元2010年，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先生的后辈写出《也同欢乐也同愁：回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》，先生弟子卞僧慧于99岁高龄完成的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亦将

付梓。

也许，只有“洪水”退去，露出文化史的河床，具备文化自觉的理念，才能够明察先生的志业与心迹，体悟静水流深的魅力和境界。

（一）“家学”与“师承”

中国文化史，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征。按照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观点，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应对生活的法则，而“文化”的西方词源，也是灌溉、养育、滋润的意思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问了：陈寅恪先生到底是吃着什么奶长大的？灌溉、滋养陈寅恪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呢？

潘光旦先生曾经撰写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，在乡土中国社会，血缘、地缘和学缘，互动共生，交错纠结，形成文化史的独特风貌。笔者理解，陈寅恪先生所说的“三纲六纪”的文化生态学，“家学”和“师承”便是其有机构成。

文化世家，依托的正是“家学”、“师承”、“会馆”所构建的文化共同体。就从陈寅恪先生本人来说，他的父亲是晚清宋诗派的陈三立，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，他的哥哥是陈师曾，而他的太太唐筼则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。学界称道“义宁满门清流”，绝非过誉。

陈寅恪先生出生和成长在具有“极优美之家风”的义宁，传承了厚朴、忠义的优美家风。出身于文化贵族的陈寅恪先生，深得文

化传统的灌溉和滋润，确实信从“出身论”，连婚姻也喜欢“门当户对”。体弱多病、游学归来的他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住在朋友赵元任先生家中。热心肠的赵太太——杨步伟女士，为了陈寅恪的婚姻大事可是没有少费心思，张罗了好多回，可是三十多岁的陈寅恪却一点都不急。最后，他于1928年与唐筼小姐一见钟情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，举案齐眉，终身扶持，堪称佳话。

（二）“亦新亦旧”的一代

陈寅恪先生面貌奇特，脸颊修长，自有一股倔强与坚毅。出身于文化世家的陈寅恪，从1902年被兄长带往日本，便断续游学于各大学府，德国柏林大学、法国巴黎大学、瑞士苏黎世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，处处留下这位读书种子的足迹。奇怪的是，陈寅恪在哪所大学都没有获得学位。陈寅恪先生漫长的游学历程，跨越晚清、民国两个时代，这一事实本身，一方面说明先生确系读书种子；另一方面，晚清民国时期，新旧杂陈，这种大背景给读书种子预留了空间，至少制度安排并没有过度阻塞、挤压读书种子。这样，陈寅恪才可以幸运地在东西洋自由自在地悠游涵咏，取精用弘。

晚清民国年间，学术界共同体所取的标尺并没有唯学历，而是看重人的学问。陈寅恪先生不是孤例，郭绍虞、钱穆、沈从文三位先生都没有什么高学历，但都可以在燕京大学、北京大

学、中国公学任教。民国年间，教育安排的人文关怀，确实令人称道。

当然，陈寅恪先生更加特殊之处在于，1926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时，可以说属于典型的“三无人物”——没有老辈所具有的进士称号，也没有新派的博士学历，而且没有任何学术著作，勉强可以拿出手的居然是给妹妹写的一封家书——《与妹书》。因为朋友吴宓的介绍，也因为梁启超先生的保荐，陈寅恪来到清华，与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诸位先生联袂，演绎了中国学术史、教育史的一段传奇。

中国文化史，在晚清、民国年间，上下五千年、纵横十万里，古今中外，奇妙地组合在一起。新文化运动崛起之后，一般学界人物，感染了一种“意图伦理”和“庸俗进化论”，总觉得“新文化”要高于“旧文化”。以为，只要引进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，也即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，那么“新文化”必然战胜腐朽衰败的“旧文化”。甚而，新派和旧派，“新潮”与“国故”，分庭抗礼，壁垒森严。

这时候，那些喜欢分派的人士，遇到陈寅恪，可就为难了。要说陈寅恪属于“旧派”吧，游学欧美近二十年；要说陈寅恪属于新派吧，又与以守旧著称的“学衡”理念相近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，与王国维先生心意相通。

蔡元培先生曾经用朱熹的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赞扬胡适之。笔者以为，胡适先生的“旧学知识”在那个时代，充其量也就是中等而已，哪里可以与世家出身的陈寅恪先生相比呢？

曾有人指出，陈寅恪先生属于文化遗少。但事实上，陈寅恪先生的可贵之处，正在于胸中自有万千沟壑，融会新旧文化，而不露斧痕。

陈先生眼中，研究中国文化史，旧派人物，失之于“滞”，新派人物，失之于“诬”。新派看陈寅恪，像是旧派；旧派看陈寅恪，像是新派；先生自己，别出心裁，融会贯通，神游冥想。

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陈寅恪先生，对待中西文化传统，具有一种温情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正面观察，贯通古今。

（三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

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呜呼！树兹石于讲舍，系哀思而不忘；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。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

——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

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，曾有三派：信古学派、疑古学

派和释古学派。学界公推陈寅恪先生为释古学派的中坚。陈寅恪先生的学问，那是有口皆碑的，但还很少有人肯定陈寅恪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。

笔者以为，陈寅恪先生不仅是饱读诗书的学者，而且是有思想的学问家。先生自己曾说过，“议论近乎湘乡与南皮之间”。不少人因为不具有开阔的胸怀和文化自觉，将清朝拦腰斩断，得出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结论；与此同时，又把晚清和民国的差别看得特别大。如此一来，既然陈寅恪先生的政治理念，不外乎位于曾国藩、张之洞之间，自然得出结论：此公属于文化遗少，大谬其实了。

不错，先生一辈子不放弃传统的形式，比方说，不屑于用简化字出版自己的著作。与其说老先生固执，还不如说那是老先生对现实文化所表达的抗议。

传统中国的思想，自从由“子学”演进到“经学”时代，多受到政治力量的牵引，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思想，多受制于天主教势力一样。

浸润欧美文化有年的陈寅恪先生，确实别具只眼，境界超拔。我们知道，陈先生的家族，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政坛，有着相当的力量。在那个学术与政治纠结缠绕的时代，陈寅恪先生秉持纯粹的理念，将学问作为一种志业，保持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。大概，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不愿意做晚清学术，进而选择中古史进行研究的一大理由。

陈先生深刻把握西方学术研究的脉络，并且终生信守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。

1927年6月2日，先生的挚友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，举世震惊，陈寅恪先生更是神伤不已。

1929年，国学研究院解散之际，同人决定立碑纪念王国维先生，碑铭最终由陈寅恪先生撰写，碑式为新会梁思成所拟，闽县林志钧书丹，鄞县马衡篆额。

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，陈寅恪精辟地指出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”读书人“著书皆为稻粱谋”，自然是没有摆脱俗谛，做学问的目的，是为了论证三民主义，依然没有摆脱束缚。只有摆脱内外各种束缚，才能够具有内心的宁静，在心灵自由的田野，寂寞地追求真理。从这里，可以见出，陈先生受到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，也是真正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学者。

陈寅恪先生的一生，正是追求独立精神、思想自由的一生。

（四）“照着讲”与“接着讲”

话说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，陈寅恪先生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。前一年，冯友兰由燕京大学进入清华，担任哲学系教授。冯友兰先生主张，对待中国哲学，不仅应该“照着讲”，还应该“接着讲”。“照着讲”，属于遗传，“接着讲”属于变异。“照着讲”是述古，“接着讲”是创新。如果，仅能“照着讲”，那么中国哲学就可能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，只有“接着讲”，才能体现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变通。

1934年9月，冯友兰先生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由商务印书馆推出，是冯先生“照着讲”的体现。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《贞元六书》，展示了冯先生“接着讲”的志业。

陈寅恪先生应邀，为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作审查报告，可以说，对“照着讲”和“接着讲”所应秉持的理念，进行了深刻的阐释。

不要想当然以为“照着讲”，接近于简单劳动。古人所留文献、文物，仅为当时遗存最小之一部，“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，表一种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。”^{〔1〕}

“接着讲”，要求更高了，必须具备高度的主体意识，才可以接着讲。“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^{〔2〕}

今天，公元2010年，义宁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，“照着讲”，就不能不对晚清民国学术史表一种同情，与民国老辈学者，处同一种境界，不得不达到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。

“接着讲”，就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，对中国文化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、处于何种状态，讲出一番道理。

由于陈寅恪先生的两部经典著述——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